

# 传习录

主编 董治安  
译注 张忠纲  
孙爱玲

中国 儒 哲  
十 大 名 著

原 著

王守仁

山东友谊出版社



集心学大成  
创阳明学派

高扬主体精神之旗帜  
引发思想解放之洪流

ISBN7-80642-307-9

I·67 本卷定价:29.00 元

全套定价:256.00 元



# 传习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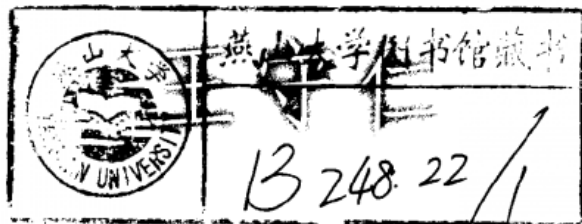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译注 孙爱玲



原 著



山东友谊出版



0780021

05  
10  
01  
2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习录/ (明) 王守仁著; 孙爱玲译注.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董治安, 张忠纲主编)

ISBN 7-80642-307-9

I. 传… II. ①王…②孙… III. ①传习录-注释  
②传习录-译文 IV. B24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78 号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传 习 录

原著 王守仁

译注 孙爱玲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 插页 41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42-307-9 / I·67

全套定价: 256.00 元 本卷定价: 29.00 元

##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编委会

主 编：董治安 张忠纲

副主编：董 时 刘凤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凤泉 牟瑞平 张茂华

张忠纲 朋 星 姚文瑞

鹿风苟 董 时 董治安



儒学，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儒哲十大名著》丛书。

从汗牛充栋的儒学典籍中，我们精选出儒学思想家的十部著名著作，加以译注。这十部著作作为《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法言》、《近思录》、《朱子性理语类》、《象山语录》、《传习录》、《思问录》。这些著作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从社会作用来看，它们都无疑是儒学著作的典范代表。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在注译过程中，编者态度严谨，付出了很大努力。首先，选择善本，对原文作了认真校勘；其次，尽可能吸收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力争做到注释详明，译语精当；此外，书前引言和篇前题解，撮其旨意，也颇能便利读者。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儒学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升温。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正在汇聚到世界现代文化的洪流中，这对全人类的

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相信，《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的出版，对于儒学进一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12月



《传习录》是明代著名哲学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代表作。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思想不仅在当时风靡于大江南北，而且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间对思想界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乃至在近、现代，对思想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切都说明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思想具有巨大的魅力。

—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曾筑室故乡阳明洞讲学，自号阳明山人，学者因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王阳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高祖王与淮精通《礼》、《易》；祖父王伦有《竹轩稿》、《江湖杂稿》刊行于世；父亲王华，字德辉，号实庵，人称龙山公，成化十年（1481）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十一岁前在祖父王伦培养下成长。青少年时期的王阳明一方面抱有“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当读书学圣贤”（《年谱》）的志向，另一方面又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他热心骑射，精研兵法，长于诗文，早享文名，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在十八岁时，他曾拜访过程朱学派学者，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他很受启发。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中乡试。后随父到京师，遍求朱熹遗书阅读，并按朱熹的格物致知去格官署里的竹子。结果，竹子的道理没格出来，反而劳

思成疾。于是，自觉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词章之学。因会试屡次不第，曾一度出入佛、老。二十八岁时，他登科进士及第，任职于工部。曾向皇帝上疏言边务八事，主张加强边防。弘治十八年（1504），王阳明三十四岁时开始讲学授徒，倡言“身心之学”，以立志成圣为宗旨，又两年与湛若水（甘泉）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与湛若水的定交，对王阳明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说这之前阳明思想还泛滥于各家，即湛若水为阳明作墓铭中所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那么，到“正德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了。

这年，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专权。王阳明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被刘瑾廷杖，并下狱，不久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地处深山丛中，到处都是蛊毒瘴疠，而且语言不通。在这种艰难环境中，阳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在静默中，开始“求理于吾心”。有一天，“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乡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

就整个王阳明思想历程看，从“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到龙场悟道之前，阳明自己的思想尚未确立，他一直为心与理的问题所困扰。他曾试图通过宋儒向外格物的办法读书、博见，再加之“诚意、正心、修身”，以实现自己从小就抱有的成圣理想。结果，成圣难以实现，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的焦虑。为此，他也曾出入佛、老，归本濂洛的心身之学，尤其与湛甘泉的“自得”宗旨相契合，然终未解决向物求理带给他的困惑。直到贬居龙场，居夷处困，在“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中，终于大悟圣门格致之旨，其学问宗旨从此立矣。此后，阳明完全抛弃了朱熹向外穷理的格致说，转入了心性之学。龙场悟道是阳明多年苦心参悟

心、物、理问题的结果，也和与湛苦水定交以来的思想发展变化有关。

刘瑾伏诛后，阳明屡迁官职，同时也开始与弟子徐爱等人讲述他的《大学》格物新说与知行合一说，后讲学规模渐大。他一度强调静坐，要求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正德十一年，他升任南赣金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在军事镇压取得成功后，他强调思想教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总结出“致良知”的学术宗旨。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又奉旨平定了明宗室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之后，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之权臣的忌能、排挤，他借服父丧，疏乞归省，回乡隐居讲学。晚年的阳明，无论心学思想、还是人格追求都进入了一种有无合一的境界。

王阳明一生追求儒家成圣理想，而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在立功、立言、立德方面，达到了中国传统士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可谓不朽矣！

## 二

《传习录》包括了王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是研究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资料。

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心”与“理”的关系问题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就心学传统而言，心、理关系更是其全部体系的核心。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王阳明反对朱熹将心与理分而为二，接受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学说。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心”来源于孟子的“本心”概念，是指完全独立于感性欲念，没有任何感性欲望染乎其间的先验主体。王阳明的“理”就是指道德法则。他在表述心与理的关系时，这样说道：“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书诸阳伯卷》，《王阳明全集》卷八）《传习录》从陆九渊“心

即理”的思想出发，阐明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哲学世界观。王阳明认为“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答顾东桥书》，《传习录》卷中）。“心”是完满自足的，包含着一切理，不必从外添加一分。如果从“心”外去求“理”，就是“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答顾东桥书》），把“心”看作是不完善、有缺欠的东西了。故而，“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答顾东桥书》）。阳明的“心外无理”主要是指“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王阳明全集》卷四）。无论格物还是致知都必须围绕着挖掘、呈现主体的善和至善的根源入手。他反复强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王阳明全集》卷七）。因为“心外无善”，所以一切学问不能离心以求，而必须反求于心，这是阳明整个心学的根本取向。

此外，王阳明认为“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卷下）。他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卷下）如果“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卷下）。王阳明认为物就是事，他说：“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传习录》卷上）可见，物不在心外。

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观点，强调心的本体性、绝对性，充分肯定认识主体的作用，无论在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有着极其宝贵的价值和意义。不过，他将主观精神之“吾心”吞并客观之“理”、“物”，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这不能说不是缺陷。

《传习录》改造和发挥了《大学》“致知”和《孟子》“良知”的思想，提出“致良知”的学说。王阳明曾说：“致良知之外无

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书魏师孟卷》，《王阳明全集》卷八）并称“致良知”为“孔门正法眼藏”（《寄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五）。“致良知”可以说是王阳明心学的最后归宿。这一学说的提出，表明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更加成熟。“良知”在王阳明这里指人的内在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实际就是伦理学上的“良心”。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答欧阳崇一》，《传习录》卷中）；同时，“良知”既然是“知”就具有“知觉”的性格，因而阳明更强调“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传习录》卷中）。在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良知”与“心”、“天理”的具体内涵是相同的，都是指封建伦理道德的仁义礼智信。王阳明说：“良知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道理，便谓之信。”（《传习录》卷下）“良知”不仅具有道德论意义，还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意义。因为他认为“心外无善”，所以，否定外在的“见闻知识”，“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传习录》下卷），主张“吾心良知”是认识的对象和源泉，为学就是体认“良知”，认识的目的是“求此心”。王阳明不仅强调“良知”的内在性，也强调其普遍性，认为“良知”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他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传习录》卷下）“致良知”就是以“致知格物”之法，去除私欲，对人心固有之道德本性“良知”进行扩充，从而恢复心体本来面目，进入一种圣贤境界。那么，怎样才能“致良知”呢？王阳明强调力行，依良知去实行、实践。他曾对弟子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传习录》卷下）“实实落落依良知去做”，就可以“致良知”。阳明还认为良知无善无恶，是超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绝对真理。善与恶对，是与非对，这些都是相

对的，只有良知是绝对的，因而，他称之为“至善”。王阳明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作为立言宗旨。表明他“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已进入一种化境，即所谓“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王畿语，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传习录》还阐发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的讨论在宋代理学中有很大发展。其中，朱熹的知行观具有着代表性。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既是针对着朱熹而来的，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后。而王阳明反对将知、行分成两截。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卷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答顾东桥书》，《传习录》卷中）知行是一个工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炼，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就把封建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两个方面都统一于人内心的良知自觉之中了。不过，王阳明这里的知、行内涵只有观念上的层次差别。如他以《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解释道：“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卷上）其“知”是指“直觉”，其“行”是指感情欲望。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卷下）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显然是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

活动的界限。但是，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他一再要求别人领会他的这个“立言宗旨”。事实上，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必须时刻切实践履的身心之学，在儒家哲学发展史上，无疑代表了儒家道德实践论的又一个高峰。

### 三

《传习录》反映的思想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阳明针对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烦琐和僵化的流弊，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从而将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为封建王朝提供了一套简便易行的伦理道德理论体系，他希望以此为挽救封建王朝的颓运发挥一定的作用。

王阳明思想形成了阳明学派，王门后学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思想，使其在明代中、晚期盛行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王阳明思想中包含着对人主体价值的肯定和对封建权威的怀疑精神，这些合理因素本来就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王学左派继承了这方面的思想，变本而加厉，为晚明个性解放的市民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如泰州学派以自然为宗，以良知为当下圆成，直心任意，率性而行，以至于“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掀起了一股冲决一切罗网的思想解放浪潮。这一浪潮广泛地影响于思想、哲学、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一时间，反礼教、反禁欲，重情主义、自然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蓬勃兴起。一些进步思想家在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启迪下，开始怀疑乃至抨击封建的专制制度。我们从李贽、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到心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应该说，王阳明心学思想在明代中、晚期确实是开启士人心智的一把钥匙，其具有的启蒙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王阳明心学思想具有的积极意义还受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

家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人的关注与推崇，并波及海外的华语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王阳明心学早在明中叶就传到了日本，并成为显学，影响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变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王阳明心学思想重视个体道德修养，忽略客观知识；在道德规范的形成上，又忽略了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到了其后学的一些门派更是任性废学，陷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泥潭，导致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对王阳明心学的严厉责备。再有，王阳明心学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肯定人性自足，否定人的欲望。事实则是，人性自足，同时欲望也不可遏制。那么，如何对待人性自足和欲望不可遏制？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在个体人身上协调？这是王阳明心学没有也不能认识，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王阳明心学本身具有的这种内在矛盾，即人性自足与人欲的对立。这种矛盾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晚明文人士一些畸变心态的出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口尧舜而身盗跖”（《明儒学案》）的双面人格在社会上的流行泛滥。

尽管如此，王阳明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他思想中体现的创造精神、勇往直前的“狂者胸次”，洋溢着生命的智慧和生机勃勃的活力，在今天仍然具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因此，对王阳明心学的合理扬弃，宏扬其思想的积极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 四

《传习录》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主要汇集了王阳明讲学语录及论学书信。书名出自《论语·学而》的“传不习乎？”“传”谓受之于师，“习”亦可训之为“觉”。所以，聂豹《重刻传习录序》说：“匪师弗传，匪传弗觉。先生以觉天下者，其于孔门何

以异哉？夫传不习，孔犹弗传也。”（《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

《传习录》全书之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正德十年（1512）开始，王阳明弟子徐爱就陆续录下王阳明平日讲学语录，题为《传习录》。然而，徐爱早逝，未及刊行。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自己新录的部分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出版，仍名《传习录》。这便是今本《传习录》卷上。

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在越（今浙江余姚）复取王阳明“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命其弟逢吉“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续刻传习录序》），名为《续刻传习录》。所谓“问答之辞”当是薛侃所刻之三卷本语录。而“讨论之书”则是南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八卷分装二册。嘉靖十四年，钱德洪订定《传习录》，对论学书信作了增删。他说：“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他列举八篇之目为“答徐成之两书，答顾东桥、周道通、陆澄、欧阳德、罗钦顺、聂文蔚各一书。并指出编定时，删去了答徐成之两书，而增加了《答聂文蔚第二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似亦为钱德洪所补录。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又将书信易为问答语，这便是今本《传习录》的卷中。

今本《传习录》的卷下，主要来源于钱德洪纂集的《传习续录》。嘉靖三十三年（1554），钱德洪就陈九川所录的《遗言》加以删削，与自己及王畿所录一同编成《传习续录》，在宁国（今属安徽）水西精舍出版。嘉靖三十五年，他又将黄以方所录的部分编入《传习续录》中，在蕲州（今属湖北）出版。这便形成了今本《传习录》卷下。

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卷上，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

为卷中，以《传习续录》为卷下，附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

谢氏隆庆《全书》本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均以此本著录影印。所以我们译注《传习录》一书，即以此本为底本，同时也吸收了近年有关著作的校勘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靖刻本《传习录》，以其年代早，刻版精，用来与隆庆《全书》本校勘，改正了《全书》本的许多错讹之处。如《全书》本卷下自248条至315条天泉证道记皆属黄省曾录，而北大嘉靖本于260条“何廷仁……”前注“门人钱德洪、王畿录”。就所录内容看，明显是钱德洪所录。所以，我们依据北大嘉靖本将这部分题为“钱德洪录”。

王阳明作为一代鸿儒，他的代表作《传习录》思想深邃，影响深远。在今天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优秀遗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伟大事业中，自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思想价值。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做了《传习录》一书的译注工作。

本书意在为读者学习研究王阳明思想，提供有益的帮助。所以，我们力求做到原文准确，注释详明，语译信达。每篇之前撰有题解，撮其旨意，以利读者理解。书后附录将相关材料集于一处，以便读者查阅。在译注过程中，对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多有吸收，我们在此谨表谢忱。由于我们学力所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不足，还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